

流域人美学导论

田
阡
／
著

LIUYU RENLEIXUE DAOLUN
TIAN QIAN



人 民 出 版 社

流域人类学导论

田
阡
／
著

LIUYU RENLEIXUE DAOLUN
TIAN QIAN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域人类学导论/田阡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01-019534-6

I. ①流… II. ①田… III. ①流域-文化人类学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7393 号

流域人类学导论

LIUYU RENLEIXUE DAOLUN

田 阡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字数:334 千字

ISBN 978-7-01-019534-6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一 让大家更多地关注流域研究

大江小河养育了我们的万物生灵，也养育了我们的人类文明！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拉斯河最早的两河文明，到埃及尼罗河文明、印度恒河文明，到我国的黄河、长江文明，这些大河孕育了文明的中心，而大河的千万条支流则成为了文明繁衍、辐射的载体。当历史的河流传颂到今天，当火车、飞机、汽车取代了航船，“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似乎成了保住乡愁的记忆。似乎流域的研究不再是显学，渐渐远离了学者的关注！

我一直认为，流域研究对人类学有重要的意义，也一直敬仰张光直先生当年在中国台湾发起的“浊大流域研究计划”。在2000年规划“211”项目时，有机会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提出了“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族群的关系研究”课题，试图整合人类学系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力量对珠江流域进行综合研究。当时课题设计的目标，一是突破中国传统“两河文明”的说法，二是勾画出珠江文明的特点，三是探讨珠江流域族群的分布与接触，四是分析珠江流域的发展与城市化特征。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还是出了些成果，如《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一书就是成果之一。

当田阡教授发来《流域人类学导论》这本著作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总体上感觉这是一本非常精彩、非常有创见的著作，在我倡导的流域研究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本书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当代区域社会发展，抑或是对于人类学学科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流域自古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并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古代开始，人类就是利用流域进行开发、利用河流进

行交流，物与人的流动、文化的传播、政治的渗透与扩张、区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等无不囊括于流域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活动于流域中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对当代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对于一个流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可能也是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点。对于今天族群的分布、人口的分布以及城市的分布，流域的影响其实一直存在。比如，长江流域的沿岸城市，或者传统码头的城市，到现在仍然十分活跃；另外，其他支流的城市，如湘江下游的长沙等，同样保持着活跃。又比如，珠江流域的沿岸城市，从珠江口一直到珠江尾，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到今天依旧明显。

第二，从学科发展来说，流域研究是超越传统社区、村落研究的一个更高、更宏观层面的研究，是区域研究的新转变。人类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社区、村落这样的微观层面，对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超越村落民族志》，诸多前辈学者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试图做一种区域的、宏观的研究，比如费孝通先生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这便是一种尝试。流域研究则是区域研究的另一种新的探索与实践，但是，对于流域的人类学研究，我觉得开展是不够的。而在这方面，田阡教授做了更多的工作。重庆地属长江流域，又属嘉陵江流域和乌江流域，所以河流对重庆这样一个城市有着特别的意义。田阡教授到重庆工作，因为地域上的优势，他在研究中即是利用重庆这个特别定位来开展流域研究，而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其中，开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也组织过专栏，现在又出了专门的著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有力地推动人类学打破单一的族群、行政区域化的限制。实际上流域形成自然的生态，虽然我们现在有桥梁，也有公路，但是流域又形成我们生态格局的一种风格，这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大的影响。我想这也是一个领域研究的重要体现。

第三，本书充分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特点，从三个纬度讨论流域：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探讨，分析了流域产生的地理地貌、气候生态对人的影响，包括农业的产生、特色植物的栽培、文明的特征、人体特征等；其次是从以水为载体所产生的人群流动、迁徙与互动，探讨了流域与交通、物资的流动、贸易圈的形成、族群关系等；

最后是从流域与权利的视角讨论流域与城市、流域与战争、流域与文明和国家等。当然作为一本教科书式的研究著作，还归纳了流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归纳了主要流域的发展史。

总之，田阡教授所著《流域人类学导论》，结合了生态、族群、民俗、移民、文化遗产等方面，是比较系统、全面地对流域进行研究的著作。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是为序。

周大鸣

2018 年 7 月 9 日于中山大学盛斯堂

序 二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流域人类学导论》是田阡教授的倾心之作。在答应田阡教授为这本书写序之后，断断续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阅读了书稿，确实欣慰于中国有了一部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流域、人和自然之间复杂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新作。这本著作不仅构建了一个流域人类学的基本框架，同时也给人更多的启发，为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指出了更广阔的路径。

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和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因此对流域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流域是一个复杂的自然和生命载体，它向理论界提出的问题必然是丰富而生动的。虽然在国内外对于流域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是仍然有必要基于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构建关于流域研究的学科分野。就本书的主题——流域人类学而言，对流域的研究为人类学的研究扩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一个方面是人类学自身的发展，诚如田阡教授在书稿中所论述的，人类学研究从点到面、从区域到流域的研究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必然；另一个方面，流域人类活动的生动性、流域治理的迫切性等必然对这门学科的专门化建设提出了呼唤。

在历史上人类依靠流域的恩赐而发展起了不同程度的文明，包括在古代埃及人们利用尼罗河泛滥的规律而发展起的农业文明，在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河流间发展起先进的灌溉农业从而支撑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黄河与长江哺育了中华文明等。流域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诞生之地，同样也是人类迁徙的重要走廊，在历史上人类沿着河流的迁徙而形成新的生存形态和文明形态，例如南非的瓦尔河是

古代人类从非洲大陆中部向南部迁徙的重要通道，亚洲的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古代很多族群迁徙的走廊。河流为流域人类的生计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不仅发展起了不同形态的农业、工业、航运业等产业，同时也发展起了农村、集镇、城市等不同的居住模式。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古代城市都是首先诞生于大河流域的。不同的流域也形成了不同的流域文明和地域文化，更显示出了河流文明的生动性。因此，人类和河流的历史互动不仅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展开了最生动的互动。在今天人类仍然在依赖河流资源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与河流互动中更复杂的关系，在这种互动中自然和人类两方面都存在挑战，需要加以应对。探讨人类从远古到今天与河流的互动关系，是河流人类学这个分支学科能够成立的重要基础。

在这本书稿中，田阡教授已经构建起了一个流域人类学的基本框架。但是就流域人类学的研究基点与视野等问题，我还想再谈一点看法供大家进一步探讨。一个学科以什么为对象、秉持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解决什么问题，是这门学科构建与存在的重要依据。首先，我认为流域人类学研究应该紧紧把握住水、河道、流域生物、人类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流域看作是一个自然与生物的共同体，细致观察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构成要素的能动性和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影响。水是河流形成的基本要素，没有水就没有河流。从河流的自然特征来说，河水包括了水量的大小、河水的季节性变化、水的物质状态如含沙量和其他的物质成分等。这一切都会对河道、流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产生影响。河水水量的大小决定了河道的体量大小、生物多样性的状态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一条河的水量大，尤其是在沿途获得更多水量补充，必然成为大河，同样也能形成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存资源。河流的季节性特征同样也影响到这些方面，例如尼罗河在不同季节的泛滥带来了营养丰富的泥沙，使农田得到灌溉和滋养，给流域的人们带来了丰厚的收获。再如湄公河中游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形成了湄公河主要河道和洞里萨湖之间水面的互补。雨季来临湄公河水暴涨之时，河水经洞里萨河灌入湖中，从而减轻了湄公河

下游的泛滥。此时洞里萨湖湖面面积从 2700—3000 平方公里扩大到 1.6 万平方公里以上，带来了渔业丰收的机会。每年枯水季节，湄公河水位降低，湖水经洞里萨河流入湄公河，补充了湄公河水量的不足，使下游的人们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湖水退去之后的湖岸成为季节性肥沃的农田。这一切使古代吴哥文明得到了丰厚的滋养。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大自然刻意给人类的恩赐，但是人类却从中获得了机遇。当然河流的泛滥往往也会给人类生存带来灾难，这一点不必多言。河流水质是河流的自然物质特征，但是它却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影响。人类的活动也会改变河流的水质，造成非自然的水质改变，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就是水体污染。

河道是河水的重要载体，也是河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河道的状态同样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能够供给流域的人类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水、形成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但与此同时自然和人类两者都可能引起河道的改变，危害到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生存。在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就给流域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灾难，同时也定义了流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流域的社会结构。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既是河流哺育的结果，同时也养护着河道的生态系统，尤其流域的植被为河流涵养补充水分，也为人类提供了河水之外的生存资源。

在以上简单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河水、河道、流域的生物多样性都对人类的生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流域来，人类是可有可无的，而对于人类来说河流却是必需的。人类努力利用大自然的恩惠去建设自己的生存家园、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但与此同时，人类也往往过度利用资源、改变河流的自然状态，从而危害到自身的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河流的三个自然要素和人类之间构建起一种有利于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平衡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流域人类学不仅要以流域为研究对象，实现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还要深入阐释流域内四大要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要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平衡点，为认识历史上人类与流域的互动关系、今天的状态、未来的前景以及解决当代及涉及人类未来

发展利益的相关问题提供智力支撑。我认为这是流域人类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基于人类学的基点，一方面是要深入阐释不同流域的自然特征是如何影响到流域人类的社会文化构建的，包括人们的信仰、人的性格、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形态、分布特征、迁移等在河流自然因素约束之下而形成的流域居民的社会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阐述人类对于流域自然特征的适应和回应，即人类如何利用流域的自然条件、改造自然使之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过程和成果，包括修建水坝沟渠、发展农业生产、水上交通、建设城镇等。同时也包括这个过程中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流域自然状态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影响等。

流域人类学既然是关注流域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流域人类学研究的方法除了固守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志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历史文献检索印证等方法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综合研究的方法。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是针对河流特征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水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方法，形成和人类学方法相融合的、能够综合研究流域各种要素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方法，我认为这是流域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当然这种方法的构建学者们可进一步去探讨和实践。总之，方法论的构建也是这一研究成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令人欣喜的是，田阡教授的《流域人类学导论》这本书已经站在了一种综合研究的高度去审视这一研究的基础和构建空间。首先从自然、社会和人类学的视野去审视流域，把流域的概念带到一个广阔的空间思维中，界定了在自然、社会和人类学视野中对流域的不同理解。其次从宏观到微观来理解流域，探讨了流域文明的产生和存在过程及流域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流域的微观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包括流域对于民族族群形成分布的影响、流域居民的迁徙等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最后还探讨了河流与人类生存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流域自然对于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包括生产方式的形成、集镇和城市的发展、水面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学艺术，乃至因为资源争夺产生的战争等。总之，把流域作为

一个综合体来看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流域内部复杂的系统关系十分重要，我们不能把流域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现象，或人类只是被动地适应流域的自然，我们应该看到流域内不同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用系统的思维去理解流域。一方面我们要构建并且去维持一个流域各种要素之间相平衡的流域系统，维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治理流域，这其中不仅要对流域内不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现象进行工程治理，同时也要构建一个流域友好型的社会，把社会和人文等要素更全面地植入流域治理过程中。今天流域在治理的过程中仍然较多地依赖工程手段，社会和人文治理的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但这种不足也正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服务于流域管理的广阔空间。《流域人类学导论》向我们展示了流域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历史和今天，思考流域的未来，构建对流域的学术研究和治理的系统思维，着重关注人在流域中的角色，我想这一点是这本学术著作对于理论和现实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郑晓云

2018年7月于昆明

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 转变的思考与探索

在现代语境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讲究范式。所谓范式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博士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范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有人认为范式理论出现后，科学的霸权地位被动摇，范式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的有力武器。从这个认识出发，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用范式理论去观察和评估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范式转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村落的社区研究到民族走廊研究，再到流域研究的路线图。

一、村落：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

村落，是中国人类学传统而经典的研究对象。1899 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打开了中国村落研究的大门，他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① 他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中国人的德行》

① [美] 明恩溥著：《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又明确地指出:“一个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那么他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待上一年,这么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国的城市待上十年还好。农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① 进入 20 世纪后,在“乡村是中华帝国的缩影”这种西方式的中国观影响下,荷兰人高延(J. J. M. de Groot)、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等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就把村落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随后,中国学者吴文藻在吸纳了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燕京学派,也倡导以社区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来观察中国。

此后,刚起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以村落为切入点,展开的“社区”研究事实上主要是村落研究。费孝通作为吴文藻的弟子,其早期研究是从少数民族村落开始的。费孝通和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在对主要调查地六巷村的研究中,完成了《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也许是机缘巧合,痛失爱妻并身受重伤的费孝通因为回到家乡吴江县养病,开展了针对开弦弓村的调查,他的研究对象转向了汉人社会。在开弦弓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完成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而悄然打开了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路线图。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学者对于人类学中国化的尝试,也都把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切入点和分析单位,例如林耀华对于义序和黄村的研究,杨懋春对于台头村的研究,许烺光对于喜洲的研究等。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出现“江村”“台头”“义序”“西镇”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田野工作地点的同时,标志着以村落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的形成。

关于社区研究的范式,特别要提出的是《江村经济》面世的范式意义和价值。人类学界周知,《江村经济》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 1938 年为《江村经济》所作的序中,不吝赞道:“(《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

① [美] 明恩浦著:《中国人的德行》,朱建国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 页。

实可以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① 马林诺夫斯基用具有奠基意义和转折意味的词语，来称赞《江村经济》从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中国村落研究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也说，这是在当时英国人类学面临从研究野蛮人和野蛮社会转向研究文明人和文明社会背景下，R. Firth 指导自己进行的“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费孝通这一“无心之作”反而在这一契机下成为世界人类学转折的第一项标志性成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江村经济》诞生的原因是“只有用我来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若是我能有相当的成绩，这成绩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

这样，费孝通以村落为单位运用田野调查法、类型比较法、功能分析法进行社区研究，成为以“小村落”反映“大社会”的范例，并发展成为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人类学者并非研究村落，他们只是在村落中做研究。当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时，“村落”就成为人类学者们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这一“社区范式”开启了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的第一个范式。

但是这个研究范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很快受到质疑。于是，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村落”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提出来。用“社区”这种起源于研究简单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有没有广泛的理论适用性？带着对社区研究方法的质疑与批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以宗族组织来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村落和社会。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并且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① 费孝通著：《费孝通全集》（第 1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与此同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者也一直对村落研究进行着反思,并且试图寻找新的分析单位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回国后,在反思《江村经济》得失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江村”的农村社区研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云南三村》其实是其“走出江村”的努力。作为比较,《云南三村》首先是在以费孝通、张之毅为首的云南“魁阁”学术团队的有意识组织下,进行的跨村级社区的系列调查。其次,在费孝通完成的《禄村农田》一文中,虽然与《江村经济》一样是以农村的土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已明显可以看出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社区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费孝通在“禄村”找到的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①研究的路径和发展方向。在云南三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在对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进行了探讨。通过多点的民族志调查,把村落类型化、典型化,进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乃至中国社会,这是费孝通这个时期研究的初衷。

正因为此,这个“社区范式”对中国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即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再次掀起了一个村落社区研究的高潮,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在此不赘述。问题在于无论是“江村”还是“三村”的研究,都无法摆脱“以点代面”和“以偏概全”的质疑。以利奇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费孝通的“利奇之感”：“虽然费孝通将他的书冠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证明他所描述的社会系统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代表性。”随着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对中国研究范围的扩大,费孝通也进一步反思区域研究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后20多次到开弦弓村调查,关注点放在村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与城镇的联系上。他主要研究了吴江县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将研究视野从一村一厂扩展到小城镇,又从小

^① 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城镇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又从单一区域跨越到多个区域，最终构建起“全国一盘棋”。他的小城镇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概括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区域论。经济区域论把费孝通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他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费孝通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费孝通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这表明费孝通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归结而言，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在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和理论模型。在“宗族”“市场”“国家—社会”这三个西方学者创立的研究范式下，中国人类学者只有找到适用性更强、代表性更强、解释力更强的分析单位与框架才能完成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提升。当时适逢西方人类学的“现代社会研究”转型，因此，我们不仅能回望之前人类学野蛮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能观察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如何逐渐浸润于重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实践当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转变成为必然趋势。

二、民族走廊：中国人类学民族历史的“区域”范式

以村落为对象的社区范式，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毕竟范围太小。“一滴水”虽能映射“太阳”，但“一滴水”并不等于江湖河流，更不等于大海。这恐怕是费孝通不得不反思、也必然会反思的问题。于是在区域研究的探索中有了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建构。

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给了费孝通灵感和智慧。如果说经济区域论侧重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考量，那么在区域研究上，与之对应，“民族走廊”则是费孝通在“文化区域”方面的探索与归纳。前者强调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是人类学对区位—空间经济的观照；后者则明显受到了“文化区域”和“文化圈”理论的影响，关注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扩散。“民族走廊”的提出，一般来说，既是对区域研究新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在回答“何为中国”的宏观整体视野下，对中华民族格局构建的深层思考。

其实，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思考源于1939年，彼时，在驳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认为“顾先生虽然论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但是仅有一个混元的一体而不考虑多元是不够的”。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抗日背景，费孝通不便将这一“多元一体”的格局进一步阐释，否则有“分裂中华”之嫌。而且当时没有找到有效的分析单位来论证“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直到1978年费孝通在当年的政协委员民族组会议的发言中首次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随后在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座谈会上提出“六板块三走廊”说。在此基础上，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Tanner讲座上提出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顾氏出于政治目的和历史理论的“中华民族一个论”不同，费孝通的“中华